

# 张大千与毕加索的“峰会晤”

张大千和毕加索皆画艺精湛，特立独行，被西方媒体褒奖为“分踞中西画坛的巨子”。1956年夏，张大千在法国尼斯港拜访毕加索，他们共进午餐，切磋画艺，互赠作品，合影留念，度过了一个融洽而愉悦的下午，此举又被西方媒体称为“中西画坛巨子的历史性的会见”。 □ 据《人民政协报》



1956年7月29日，张大千与毕加索在古堡花园。

## 张大千演示毛笔的运用

1956年，57岁的张大千应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乔治·萨尔的邀请，偕夫人徐雯波前往巴黎，一连举办了两个画展：一是6月在巴黎赛那奇博物馆的《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二是7月在卢浮宫东画廊的《张大千近作展》。两个画展都极为成功，让西方艺术家和观众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东方艺术的巨大魅力，法国媒体甚至指出：“张大千的画法变化多端，造型技术精湛，颜色时时革新，其画与西方画风对照，惟有毕加索堪与张大千比拟……”

画展开幕式结束后，张大千提出要会晤有西方“艺坛教父”美誉的毕加索。然而，中外朋友却众口一词予以劝阻，他们认为，毕加索天马行空、心高气傲，总是拒人千里，让人难以捉摸。当时留法的中国画家常玉、赵无极、潘玉良皆直言不愿牵线联系，乔治·萨尔馆长也表示爱莫能助。张大千心有不甘，让翻译直接打电话给毕加索的秘书，一番周折后，毕加索答应张大千在他的别墅会面。

7月29日中午11点30分，张大千夫妇如约来到毕加索位于法国南部尼斯港的“加尼福里亚”别墅。别墅紧依地中海，占地约百亩，毕加索定居在这里已有10年时间，它原是一位公爵的城堡，毕加索斥资百万美金购下后，将它装修成富丽堂皇、豪华精致、拥有奢侈设施的古代宫殿式建筑。

75岁的毕加索一改原先在家里赤膊赤脚、不穿上衣、只穿短裤的习性，破例穿上了条子花纹衬衫和非常正式的长裤、皮鞋，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热情接待了到访的张大千夫妇。主客用过午餐后，毕加索将张大千迎进大画室。整个别墅布置考究，但画室内却凌乱不堪，四处堆放着未完成的画稿、雕塑以及半成品的陶器。毕加索捧出5大本画册，每册约有30多张画，诚恳地对张大千说：“这些都是我画的。我最近对中国画很感兴趣，正在学习。张先生看看画得怎样？请多指教。”西画大师竟然在自学中国画，这让张大千颇感惊讶，他不由得好奇地翻阅着，可发现尽是些“花鸟鱼虫”，显然是临摹齐白石的习作，笔法很是稚嫩。于是委婉地说道：“你画得很好，但工具不对。画水墨画应该用中国的毛笔，依靠含水的多少来控制干湿浓淡，体现出‘墨分五色’。我们中国画不求形似而重写意，素有诗、书、画融合的特色……”说完，当场写下“张大千”三个大字，墨色深浅有致，笔力苍劲雄厚，毕加索不禁叹为观止。

## 合影留念，互赠作品

毕加索随后又看着张大千，颇为不解地说：“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习艺术……不要说巴黎没有艺术，整个西方，白种人没有艺术！”张大千听了一怔，连忙解释道：“毕加索先生太客气了，我们中国画自然是源远流长，因为我们中国是个历史太古老的民族，但西方也盛产出非常多和非常优秀的艺术！”不料，毕加索却又惊世骇俗地指出：“真的！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的艺术，其次是日本的艺术，当然是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于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有艺术。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东方人非要跑到巴黎学艺术不可呢？”

这时，一位画商拿着5张签有毕加索名字的画作进来，请画家鉴定真伪。毕加索一下子变得狡黠起来，转而请张大千代为鉴定。张大千心里知道，这是毕加索有意要考量他的艺术涵养。他打起精神，审视再三，最后挑出两张赝品。毕加索见状，钦佩不已，一旁的画商更是瞠目结舌。事后，张大千仍心有余悸：“幸亏给我说对了，万一错了，哪个下台？”

黄昏临近，毕加索邀请张大千夫妇去花园散步，并陪同他们四处参观。毕加索平时不喜欢别人为他照相，可是当徐雯波拿出相机时，他却主动与张大千站在一起，于是定格下了两位绘画大师的多张合影。毕加索興味盎然，不无幽默地建议大家一起戴上面具，因此又拍摄了一组别有情趣的遮脸照。

欢快的时光总是短暂。临别前，很少送人画作的毕加索将自己的一幅《西班牙牧神像》赠送给张大千，又一反常态用英文补题了“D.G.Chang”，以示尊重和友好。张大千则把自己在巴黎所作的《墨竹图》作为回礼送给毕加索。画面上，右边的竹子用浓墨挥写，竹叶向上伸展，遒劲挺括；左边的竹子以淡墨映衬，竹叶向下低垂，温柔纤细；双竹情态各异，浓淡错落，凸显出张大千笔下中国画墨分五色、层次互见的笔墨神韵。画的一侧，则题款“毕加索老法家一笑丙申之夏张大千爰”。同时，将两支精制的中国毛笔和一套中国汉代石刻画像拓片送给毕加索留念。

第二天，当代画坛东西方两大宗师——张大千和毕加索在法国会晤的新闻，遍见欧美报刊。

## 四夷馆：第一所官办外语院校

随着中原王朝对外交往活动的不断深入，外语的重要性开始逐步凸显。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外语人才的培养只能依靠自学或者师徒传承来完成，官方并无专门的机构进行教习。直到明代开设“四夷馆”，中国古代官方的外语与翻译教学才开始走向制度化。

明朝建立之初，明廷与蒙古贵族的接触非常频繁。这时，精通蒙汉双语的翻译官就成为稀缺人才。明太祖朱元璋曾命翰林院侍讲火原洁（蒙古人）和编修马沙亦黑（色目人）编纂首部蒙汉词典——《华夷译语》，供翻译人员学习使用，以使“使臣往复朔漠，皆能通达其情”（《明太祖实录》）。

永乐年间，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对外交往活跃，前来朝贡的外国使团增多。为应对外事需求，明成祖朱棣在永乐五年（1407年）正式“设四夷馆，译其文字”（《皇典考》）。从此，直至清末设立京师同文馆之前，四夷馆一直是中央政府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的主要阵地。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四夷馆俨然是一座高等外语院校。馆内开设多个语种专业，主要承担语言教习和文书翻译工作。据《大明会典》记载：“凡四方番夷翻译文字，永乐五年设四夷馆，内分八馆，曰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可见早期的四夷馆就开设了八个语言专业，其中鞑靼馆教习蒙古文，女直馆教习女真文（即金朝时期创立的女真文字），西番馆教习藏文，西天馆教习榜葛兰文（即孟加拉文），回回馆教习波斯文，百夷馆教习傣文，高昌馆教习畏兀儿文（一种用回鹘字母书写的文字），缅甸馆教习缅文。到了正德八年（1513年），因泰缅一带局势紧张，又增设八百馆，用以教习兰纳文（即用于书写北部泰语的文字）。万历七年（1579年），因暹罗贡使数度坚持用泰文提交国书（以往暹罗的国书皆用波斯文书写），明神宗又专门设立暹罗馆。至此，形成了明代四夷馆十大语言专业。

与今日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类似，四夷馆也接受国家行政机构的管辖。“初设四夷馆隶属翰林院”（《明史·职官制》）。起初，四夷馆仅作为翰林院的附属教学机构而存在。到了弘治七年（1494年），“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遂改隶太常寺”（《明史·职官制》），中央委派太常寺卿和少卿两名官员来“提督四夷馆”，而四夷馆的上级主管单位也换成了太常寺。

四夷馆的教师队伍来源比较复杂。明初，前元时代的异族官员大量出任明朝，其中不少凭借其多

语种背景担任通事（即翻译）。到四夷馆设立时，不少通事直接进入四夷馆任教，如《明成祖实录》就记载：“（徐）晟，鞑靼人……哈的，回回人。二人自永乐初以翻译外夷文字召用……”随着郑和七下西洋，大量外国使节赴京朝贡，明廷甚至直接将使节召入四夷馆充作外籍教员。比如《四夷馆考》曾载：“缅甸人当丙、云清等六名以进贡至京，俱留本馆教授”。这些缅甸使节一直被留到天顺年间，缅甸派使团来要，却遭明廷拒绝，最后竟全部客死北京。此外，还有不少本馆的优秀学生学成后直接留馆任教。

四夷馆的招生方式也颇为特别。永乐年间，招生对象主要是各地的监生，不过这时的招生工作居然是强制性的，也并无定则。如“永乐五年三月癸酉，命礼部选胡敬等监生三十八人，隶翰林院译书”（《南雍志》），以命令的形式强制送去学习翻译。对这些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监生而言，寒窗苦读就是为了日后金榜题名，但进入四夷馆，势必无法集中精力备考。就算从四夷馆毕业，也至多得到个通事一类的从九品“芝麻官”，对于有志于科场的莘莘学子而言，实在得不偿失。尽管朝廷在物质上对四夷馆学生多有优待，却还是“诸生多不悦，辄生谤议”（《国朝典汇》）。

有鉴于此，宣德以后，四夷馆的招生范围开始扩大到官民子弟，后又包括军民与匠吏子弟。这些无功名在身的“待业”青年更看重四夷馆的优厚待遇及毕业后授官的诱惑，一时间趋之若鹜。“近年官员、军民、匠吏之家子弟，往往私自投师习学番字，希入翰林院译馆。”（《明英宗实录》）可见报考有多火爆！因报考人数过多，到了嘉靖年间，明廷将录取标准全面收紧，提高了各语种考试难度，还将录取年龄限定在25岁以下，从而提高了录取质量。

四夷馆为明朝源源不断地提供专业的翻译人才。到了清代，除女真、鞑靼二馆被撤，四夷馆其余八馆均留用。因满清统治者对“夷”字多有忌讳，而将其更名为“四译馆”。不过，随着统一战争的进行，清朝疆域不断扩大，旧有的四译馆已经非常不合时宜。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廷将负责接待朝贡使节的“会同馆”与原“四译馆”合并，改称“会同四译馆”，归礼部所管。表面上将两机构合并于一处，实际上则是四译馆被会同馆整体吞并。随着教师与生源的流失，四夷馆已名存实亡，直到咸丰年间被京师同文馆取代，并在光绪年间与会同馆一道被裁撤。

□ 据《北京晚报》